

风险态度、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分析

——基于豫鲁皖冀苏 1 429 户农户面板数据

王 倩,管 睿,余 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农地流转不仅涉及预期收益和成本等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分析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全面推动中国农地流转,使其跳出内卷化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 5 省 15 县 1 429 户农户面板数据,就农地流转行为进行面板 Logit 模型、面板有序 Logit 模型及面板 Tobit 模型随机效应回归,并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去除风险规避态度的效用,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和流转规模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流转租金上涨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了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降低了土地转入意愿,是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加大各类保险的覆盖范围及赔偿力度,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 风险态度; 风险感知; 农地流转;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 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9)06-0149-10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9.06.018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小规模农业经营日益暴露弊端,深陷低利润甚至负利润的自我剥削陷阱^[1],农地流转成为解决土地细碎化及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仍难以适应农业规模经营的需求。截至 2016 年底,全国流转土地面积共 4.71 亿亩,占承包土地面积的 35.1%。虽然我国农地流转规模在不断增加,但从 2015 年开始农地流转增速有所放缓。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土地流转率较上年增加 4.66%,2015 年增幅降低至 2.94%,2016 年土地流转率仅增长 1.7%^①,2017 年流转比例与上年基本持平。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呈现“内卷化”发展的特征^②,表现为流转规模小、结构不协调等^[2],增加了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优化配置的难度,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进程。

农地流转市场“内卷化”困境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农户在土地市场中的处置行为内在运行机制存在不一致^[1],传统成本收益理论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解释。农地流转不仅涉及预期收益和成本等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3]。尽管现有研究从社会经济条件^[4]、土地制度^[5]、土地特征^[6]等视角探析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但对流转主体的研究仍有欠缺^[7],尤其是对流

收稿日期:2019-05-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公共政策个体风险研判实验及拟合匹配研究——以陕甘鲁豫 1 600 农户为例”(715732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三权分置”下农地流转个体偏好研判实验及政策演进研究——基于豫鲁冀皖苏陕 1 493 农户跟踪面板数据”(71874139)。

作者简介:王 倩(1990-),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① 数据来源:根据土流网(<https://www.tuliu.com/data/nationalProgress.html>)提供数据整理而得。
② 农地流转“内卷化”表现为虽然国家大力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但其发展速度呈现逐渐降低的态势,无法实现根本性突破。

转双方的心理状态关注较少。本文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共 5 省 1 429 户农户调查数据进行面板随机效应回归,探讨风险态度及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方向及路径,得出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的主要原因,对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文献综述

在自然灾害、市场波动、技术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下,农业生产是一项风险较高的产业^[8-9],发展中国家农业经营面临的风险更为明显^[10]。农户作为行为“经济人”,对收益和损失有特定的偏好,且农业风险认知有限,因此,风险态度及风险感知对农户的农业决策有重要影响。首先,农业生产决策涉及实现最大利润、规避风险、减少家庭劳动投入等多个目标,农户风险偏好决定了家庭在农业生产中各目标的次序^[11]。其次,风险态度对农民农业投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2]。研究表明,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农户越倾向于施用更多化肥以避免潜在产量损失^[9]。另外,不同风险偏好使得种稻大户农业技术应用决策有明显差异,其中风险偏好型种稻大户对农业技术的接受程度较高^[13]。Liu 等、Brick 等和 Aimin 认为风险规避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推迟采用新技术^[14-16]。在同样的风险环境下,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差异也会导致其形成不同的风险应对策略^[17],表现为农户对风险的感知和担忧越强,越有可能采取应对措施^[18]。

受恶意囤地、毁约弃耕、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影响,农地流转存在政策、制度、合同、管理、市场和经营等风险^[19]。部分学者关于风险态度及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展开了研究。孙小龙等指出风险规避对农户转出土地的可能性及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转入土地的可能性及转入规模没有影响^[7]。陈振等认为农户风险感知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决定性因素,流转租金过低和拖欠流转租金风险,流转后再就业和养老保障风险,土地非粮化、土地硬化以及撂荒风险显著抑制了农户的转出意愿^[20]。杨卫忠以浙江嘉兴市为例,实证分析得出农户风险感知和风险态度对农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21]。可见,农地流转经营主体的风险态度及风险感知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但目前仍缺少大样本面板数据为基础的实证分析,且将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学者也没有将农户主观认知与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内卷化陷阱相结合来进行分析。

2.理论分析

风险态度是农户对风险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可以分为风险偏好、风险中立和风险厌恶三种类型。风险厌恶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经常持审慎态度,其经济行为也往往表现出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地方,但实质上是农户出于“避免灾难”的理性考虑结果^[22]。农地流转作为一项风险事件,风险厌恶的农户往往为降低风险不愿参与其中。同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农户并不能对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风险做出准确判断,风险感知是农户对土地流转风险最直观的判断,影响了农户的最终决策。通常而言,当农户感知到农地流转中存在较高的风险且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时,也往往不会流转土地,如农户对土地产权的不安全感知对农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23]。由此,得出假设 1。

假设 1:风险规避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和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

风险感知及风险态度作为农户对待不确定事件的主观认识,对经营主体决策的影响存在某种关联。杨卫忠将风险感知和风险态度的交互项代入模型,得出其回归系数为显著性负值,即风险态度对风险感知存在调节效应^[21]。陈新建等在研究贫困问题时,也认为风险态度与风险感知的交互效应强化了贫困户风险管理的事前事后差异^[17]。从理论上讲,风险感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行为主体的态度,与之密切相关主体的行为,知觉行为控制,经验行为、行为组织化程度及自身特征等因素^[24]。可见,风险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风险感知,最终对农地流转行为产生作用,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非是调节效应,而应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各变量间关系见图 1。由此,提出假设 2。



图 1 变量逻辑关系

假设 2:风险感知是风险态度影响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及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农村入户调查获取的一手数据。实地调研在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 5 个省份展开,5 省辖区内地势均以平原为主,粮食生产表现为小麦、玉米轮作耕种,一年两熟,是我国的粮食主产省;另外,5 省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超过 30%的承包土地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流转,江苏省土地流转率甚至已超过 60%。以这 5 省为例研究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首先,课题组在每个省选取 2~3 个地理位置不相邻的市,并在每个市选择 1~2 个不相邻的县(县级市),最终确定河南省西平县、正阳县、罗山县、荥阳市、新郑市,山东省曹县、郓城县、寿光市和乐陵市,安徽省临泉县、颍上县、肥西县,河北省宁晋县、高邑县以及江苏省丰县共 15 个县(县级市)为样本区域。随后,从每个县(县级市)中随机选取 1~2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1~2 个村。最后,利用随机乱码表从样本村庄花名册中按比例抽取约 30 户农户进行一对一入户式访谈,每户访谈时间持续约 1 个小时。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获取有效样本 1 429 户;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2 月,课题组完成了对 1 225 样本农户的跟踪调查,样本跟踪率达 85.7%。调查问卷涉及农户家庭人口及就业信息、承包土地信息、土地流转信息、家庭收入等重要内容,为本文面板模型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2.模型构建

为探究农户风险态度及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构建式(1):

$$Y_{it} = \alpha_i + \beta risk_{it} + \gamma X_{it} + \delta \vartheta_j + \epsilon_{it} \tag{1}$$

式(1)中, Y_{it} 为因变量,表示农户*i*第*t*年的农地流转行为(或流转意愿)。 $risk_{it}$ 为农户*i*的风险规避态度或风险感知; X_{it} 为农户特征向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及资源禀赋特征; ϑ_j 为县域虚拟变量,用于控制不同县域的差异, ϵ_{it} 为残差项。 α_i 为个体效应, β 、 γ 及 δ 为待估计系数。

考虑到农户土地转入、转出决策属于二分类变量,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回归中使用面板 Logit 模型,模型表达式见式(2)。

$$f(Y_{it}) = \ln \frac{P(Y_{it})}{1 - P(Y_{it})} = \alpha_i + \beta risk_{it} + \gamma X_{it} + \delta \vartheta_j + \epsilon_{it} \tag{2}$$

$P(Y_{it}=1)$ 表示农户*i*在*t*年流转(转入/转出)土地的概率,若 β 的估计值为显著性负值,则表明风险规避态度或风险感知显著抑制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

至于风险规避态度及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规模的影响,因方差较大的原因,直接将转入、转出土地面积代入模型会加大估计结果的偏差,需进一步做出处理。一方面,本文将转入户的流转土地规模划分为 20 亩以下、20~50 亩、50~100 亩、100 亩以上共 4 等,并分别赋值为 1、2、3、4,其余农户转入土地规模设定为 0,此时农户转入规模为有序离散变量,使用面板有序多分类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另一方面,转出意愿较强的农户往往会转出全部土地,否则可能会只转出部分土地,本文基于转出土地面积与承包土地面积的比例得到农户转出地占比,以此为基础衡量转出土地规模。转出地占比取值介于 0 和 1 之间,存在上限和下限,使用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为消除时间可变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对各模型均采用面板随机效应进行回归。

3.变量选择及统计性描述

表 1 给出了本文使用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下面将对其进行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基于农地流转行为,被解释变量选择农户转入决策、转出决策、转入规模及转出地占比 4 个变量。风险规避态度及风险感知对农户未来的土地流转意愿也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同时将来两年内农户是否有转入土地扩大规模的未来转入意愿或转出更多土地的将来转出意愿设定为被解释变量。统计结果显示,2015—2017 年间,转入户占比由 23%减少至 19%,转出户占比由 39%

增加至 40%，农户结构发生变化，土地需求降低，农地流转速度减慢。未来两年有转入土地意愿的农户仅占 28%，有转出土地意愿的农户占 24%，可见农户未来的土地流转意愿也处于较低水平，土地流转增长潜力有限。

(2)关键解释变量:风险规避态度及风险感知。结合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建立农户风险规避态度及风险感知度量表。由于风险规避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推迟采用新技术^[14-15],本文通过“当推广农业新技术或产品时,您是否会采用?”这一问题来捕获农户的风险规避态度,使用分值 1~5 进行衡量,取值越低表示农户在农业生产中越偏好风险,取值越高表明农户越倾向于风险规避。风险感知为调查对象对转入土地和转出土地存在风险的主观评价,农户利用已获得信息对农地流转风险给出得分值。本文基于农户对“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您觉得转入土地是否是一种冒险行为?”“您觉得将土地转出是否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使用 1~5 衡量农户对农地流转风险感知的评价,得分值越高,农户对农地转入或转出感知到的风险越高。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及村庄特征几个方面选取指标,其中户主特征选取户主年龄、受教育年数、健康程度、职业类型、非农就业经历共 5 个变量;家庭特征使用劳动力数量、学生数量、农业生产水平 3 个变量;家庭资源禀赋特征选取承包土地面积、农业机械价值、家庭债务余额 3 个变量,村庄特征选取所在村平均收入及离县城距离。统计结果表明,2015 年户主平均年龄为 55.06 岁,平均受教育年数为 7.60 年,74%的户主身体状况为健康或基本健康,46%的户主职业类型以农业为主,50%的户主有非农就业经历。从家庭特征看,家庭人口数量平均为 4.29 人,劳动力数量为 2.63 人。农户资源禀赋中,承包土地面积均值为 6.94 亩,拥有农业机械价值超过 1 万元农户仅占 12%,农业生产以小规模为主。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2015 年	2017 年
被解释变量			
转入决策	是否转入土地,是=1;否=0	0.23	0.19
转出决策	是否转出土地,是=1;否=0	0.39	0.40
转入规模	未转入土地=0;20 亩以下=1;20~50 亩=2;50~100 亩=3;100 亩以上=4	0.41	0.36
转出地占比	转出土地面积在承包土地面积中所占比例	0.34	0.37
未来转入意愿	未来两年内是否有转入土地打算,是=1;否=0	0.28	0.11
未来转出意愿	未来两年内是否有转出土地打算,是=1;否=0	0.24	0.23
关键解释变量			
转入土地风险感知	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转入土地是否是一种冒险行为? 不算冒险=1;有点冒险=2;一般冒险=3;比较冒险=4;非常冒险=5	1.75	1.69
转出土地风险感知	您觉得将土地转出是否是一种冒险行为? 不算冒险=1;有点冒险=2;一般冒险=3;比较冒险=4;非常冒险=5	2.38	2.70
风险规避态度	推广农业新技术或产品时,您是否会采用? 直接采用=1;只要有人用就一起用=2;采用的人多了就一起用=3;看别人使用效果再用=4;不采用=5	2.66	2.62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55.06	57.13
户主受教育年数	户主受教育年数	7.60	7.00
户主健康程度	健康=1;基本健康=2;患慢性病,但不影响劳动=3;患大病,能自理=4;不能自理=5	2.15	1.67
户主职业类型	农业为主=1;兼业生产=2;非农为主=3	1.83	1.92
户主非农就业经历	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是=1;否=0	0.50	0.50
劳动力数量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2.63	2.60
学生数量	家庭学生数量/人	0.81	0.74
农业生产水平	很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2.97	2.97
承包土地面积	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亩	6.94	6.93
农业机械价值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万元	0.87	0.95
家庭债务余额	家庭债务余额/万元	1.07	1.10
所在村庄平均收入	农户所在村平均收入/万元	10.25	9.51
离县城距离	离县城商贸中心距离/千米	21.63	21.63

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实地调研并整理得到。

三、计量结果分析

1.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1)风险规避态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面板 Logit 模型、面板有序多分类 Logit 模型及面板 Tobit 模型对农地流转决策及流转规模进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2。可以看出,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在 5%的水平上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转入规模在 10%的水平上也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对农业技术及产品的接受程度越慢,越倾向于风险规避,其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低,且转入土地规模也往往较小。然而,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在 10%的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农户对农业新产品或新技术的接受程度较低,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对家庭贡献程度低,农业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应用并不会显著改善家庭收益,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减弱,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也更倾向于采用粗放型经营方式,土地转出意愿增强。因此,对农业新技术或产品接受程度低的农户更倾向于将土地转出,且转出地占比也往往处于较高水平。

表 2 农户流转决策及规模回归结果

变量	转入决策		转入规模		转出决策		转出地占比	
	(1)	(2)	(3)	(4)	(5)	(6)	(7)	(8)
风险规避态度	-0.260** (0.114)		-0.195* (0.105)		0.184* (0.107)		0.079* (0.041)	
风险感知		-0.279*** (0.100)		-0.280*** (0.088)		-0.334*** (0.124)		-0.134*** (0.042)
户主年龄	-0.091*** (0.018)	-0.092*** (0.019)	-0.095*** (0.018)	-0.095*** (0.018)	0.064*** (0.015)	0.063*** (0.015)	0.026*** (0.006)	0.025*** (0.006)
户主受教育年数	0.108** (0.051)	0.116** (0.052)	0.100** (0.045)	0.106** (0.045)	0.078* (0.040)	0.069* (0.041)	0.035** (0.016)	0.032** (0.016)
户主健康程度	0.350** (0.163)	0.353** (0.166)	0.159 (0.145)	0.146 (0.148)	-0.023 (0.139)	0.023 (0.140)	-0.075 (0.051)	-0.055 (0.051)
户主非农就业经历	-1.597*** (0.244)	-1.611*** (0.248)	-1.656*** (0.252)	-1.677*** (0.256)	2.139*** (0.248)	2.197*** (0.254)	1.207*** (0.082)	1.217*** (0.082)
户主职业类型	-0.695** (0.335)	-0.725** (0.340)	-0.512 (0.321)	-0.532 (0.325)	-0.099 (0.308)	-0.163 (0.313)	-0.282** (0.125)	-0.301** (0.125)
劳动力数量	0.227* (0.124)	0.230* (0.126)	0.212* (0.124)	0.211* (0.125)	-0.222* (0.121)	-0.242** (0.123)	-0.142*** (0.042)	-0.147*** (0.042)
学生数量	0.011 (0.159)	-0.001 (0.165)	-0.086 (0.148)	-0.096 (0.152)	0.122 (0.161)	0.126 (0.163)	0.025 (0.057)	0.024 (0.057)
农业生产水平	0.215 (0.198)	0.236 (0.200)	0.346* (0.183)	0.365** (0.185)	-0.553*** (0.190)	-0.581*** (0.194)	-0.232*** (0.079)	-0.244*** (0.079)
承包土地面积	-0.035 (0.027)	-0.036 (0.028)	-0.010 (0.026)	-0.011 (0.027)	0.037 (0.028)	0.036 (0.029)	-0.055*** (0.011)	-0.056*** (0.011)
农业机械价值	0.438*** (0.144)	0.464*** (0.150)	0.408*** (0.105)	0.417*** (0.108)	-0.046 (0.038)	-0.050 (0.039)	-0.001 (0.013)	-0.002 (0.013)
家庭债务余额	0.029 (0.023)	0.031 (0.027)	0.038 (0.024)	0.040 (0.027)	0.053** (0.023)	0.051** (0.022)	0.015** (0.008)	0.014* (0.007)
所在村平均收入	0.188*** (0.037)	0.194*** (0.038)	0.222*** (0.035)	0.229*** (0.036)	0.091*** (0.025)	0.087*** (0.025)	0.053*** (0.011)	0.051*** (0.011)
离县城距离	-0.004 (0.017)	-0.007 (0.018)	0.007 (0.016)	0.005 (0.016)	-0.061*** (0.017)	-0.060*** (0.017)	-0.017** (0.007)	-0.017** (0.007)
县级差异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220 (2.300)	-2.142 (2.282)			-7.277*** (1.607)	-5.977*** (1.591)	-3.090*** (0.614)	-2.529*** (0.605)
观察数	2 355	2 355	2 358	2 358	2 358	2 358	2 358	2 358
样本数	1 224	1 224	1 224	1 224	1 224	1 224	1 224	1 224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2)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风险感知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的影响均为负值,并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当农户感知到转入土地存在的风险较高且超出其承受能力时,农户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较低,转入土地规模也较小。风险感知对农户土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的影响也为负值,并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当农户感知到转出土地后可能存在拖欠租金或难以实现非农就业等风险时,其转出土地意愿较小,即使农户已将土地转出,可能只是出于耕作便利、人情往来等原因而进行的私下流转,转出地占比较低。可见,风险规避态度及风险感知均对农地流转决策和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1得以证明。

(3)其他变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首先,户主年龄对农户土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下降,农业生产受到限制,农户转入土地的可能性降低,转出土地的可能性增加。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有效获取信息发挥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农户转入土地的积极性,因此户主受教育年数对土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的正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增加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生产是一项高体力劳动,户主健康程度对转入土地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转入规模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户更容易实现劳动力从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且工资水平的提高使非农就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明显,因此,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就业越倾向于非农产业,农业生产在家庭中地位越低,农民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低,故户主职业类型对转入决策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农户转出决策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家庭特征中,劳动力数量对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在10%的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越低,且转出地占比也越低。农业生产水平对转入决策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对农户转入规模的影响为显著性正值,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的影响在1%的水平为显著性负值,即生产水平越高的农户越不愿将土地转出,农地流转促使土地从生产水平低的农户流转至生产水平高的农户,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家庭资源禀赋中,承包土地面积仅对转出地占比的影响在1%的水平为显著性负值,在转出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承包土地面积越大的农户转出地占比往往越低。农业机械作为一项固定资产投资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机械的专用性使拥有农业机械价值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转入土地从事规模化经营,但农机租赁服务可使没有农业机械的家庭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因此,农业机械价值对转入决策及规模的正向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农户转出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债务余额反映了家庭的资产情况,债务负担重的农户往往因缺少资金而较少转入土地,但亲戚、朋友间不规范流转使部分家庭债务负担重的家庭仍有可能转入土地,家庭债务余额对转入决策的影响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需要指出是,家庭债务余额对转出面积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非农就业工资的不断提高,债务负担重的家庭更愿意通过非农就业尽快偿还债务,劳动力倾向于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将土地转出给新型经营主体获得较高的土地租金,土地转出意愿提高。

村庄特征中,农户所在村平均收入反映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当地经济进步可以有效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因此,农户所在村平均收入越高,农地流转市场越完善,农户转入、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居住位置离县城越近,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农户越愿意将土地转出从事非农就业,因此离县城距离对农户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负向影响。

2.农户未来土地流转意愿分析

基于随机效应Logit模型对农户未来两年内的农地流转意愿进行回归(见表3),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可以看出,风险规避态度仅对未来转入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未来转出意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风险感知对农户未来转入、转出土地的意愿均有负向影响,并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农业生产中,农户风险规避程度越高,未来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低。然而,农户一旦习惯了特

定的种植结构和生产方式,农地流转也不是农民的必要选择,农户不会轻易做出流转决策,风险规避态度对转出意愿无显著影响。农户感知到转入或者转出土地存在较大风险时,不仅其当下流转土地的可能性较低,在未来两年流转土地的意愿也较低。

表 3 农户未来农地流转意愿回归结果

变量	未来转入意愿		未来转出意愿	
	(1)	(2)	(3)	(4)
风险规避态度	−0.199*** (0.072)		−0.105 (0.081)	
风险感知		−0.215*** (0.066)		−0.435*** (0.101)
户主及农户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级差异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575 (1.036)	−0.526 (1.041)	−5.518*** (1.215)	−4.829*** (1.217)
观察数	2 187	2 187	2 269	2 269
样本数	1 140	1 140	1 223	1 223

3.风险态度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检验风险态度对农地流转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参照温忠麟等^[25]的研究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步骤 1 中就风险规避态度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若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停止中介效应分析。若风险规避态度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步骤 2 中加入风险规避态度对风险感知进行回归,步骤 3 中同时加入风险规避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行为进行回归。若步骤 2 中风险规避态度及步骤 3 中风险感知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否则需要进行 Sobel 检验。风险规避态度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风险规避态度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因变量	检验变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总效应
转入决策	风险规避态度	−0.260** (0.114)	0.060*** (0.022)	−0.245** (0.115)	−0.015	0.058
	风险感知			−0.265*** (0.100)		
转出决策	风险规避态度	0.184* (0.107)	0.099*** (0.188)	0.232** (0.113)	−0.048	0.261
	风险感知			−0.363*** (0.127)		
转入规模	风险规避态度	−0.195*** (0.105)	0.060*** (0.022)	−0.182* (0.107)	−0.013	0.067
	风险感知			−0.271*** (0.088)		
转出地占比	风险规避态度	0.079* (0.041)	0.099*** (0.188)	0.096** (0.041)	−0.017	−0.215
	风险感知			−0.146*** (0.043)		
未来转入意愿	风险规避态度	−0.199*** (0.072)	0.060*** (0.022)	−0.188*** (0.073)	−0.011	0.055
	风险感知			−0.204*** (0.066)		
未来转出意愿	风险规避态度	−0.105 (0.081)	0.099*** (0.188)	−0.070 (0.083)	—	
	风险感知			−0.429*** (0.101)		

首先,步骤 1 风险规避态度的系数除在未来转出意愿的回归中不显著外,在转入决策、转出决策、转入规模、转出地占比、未来转入意愿的回归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步骤 2,风险规避态度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步骤 3,风险感知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风险规避态度的系数仍然显著。由此可知,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假设 2 得以证明。观察中介效应结果可知,风险规避态度对转入决策、转入规模、未来转入意愿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分别为 5.8%、6.7% 和 5.5%。风险规避态度对农地转出决策、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中介效应与之相反,抵消了其正向效应,减弱了风险规避态度的影响幅度,故此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为负值。

4.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净影响

风险感知不仅在风险规避态度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路径中充当了重要的中介变量,其本身也会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控制风险规避态度的效用后,就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进行重新回归,得到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净影响,结果见表 5。可以看出,风险感知对转入决策、转入规模、未来转入意愿、转出决策、转出地占比的净影响均在 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未来转出意愿的净影响在 5%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净影响为显著性负值,即当感知到农地流转存在较高风险时,农户选择不流转土地以降低潜在损失。

表 5 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净影响

变量	(1) 转入决策	(2) 转入规模	(3) 未来转入意愿	(4) 转出决策	(5) 转出地占比	(6) 未来转出意愿
风险感知	-0.267*** (0.101)	-0.272*** (0.089)	-0.204*** (0.066)	-0.297*** (0.097)	-0.121*** (0.032)	-0.148** (0.061)
户主及农户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级差异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227 (2.284)		-0.595 (1.042)	-6.868*** (1.583)	-2.891*** (0.599)	-5.778*** (1.198)
观察数	2 355	2 358	2 187	2 358	2 358	2 269
样本数	1 224	1 224	1 140	1 224	1 224	1 223

四、讨 论

农户风险态度及风险感知对其农地流转行为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农户风险态度及风险感知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地流转进程。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及成熟,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风险规避态度均值由 2.66 降低至 2.62,且看别人使用效果后采用和不采用新技术或产品的农户占比由 30% 下降至 21%,在农业生产中的风险规避行为有一定程度减弱,这有利于增加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进一步推动农地市场发展。然而,2015 年认为转入土地比较冒险和非常冒险的农户在样本中占比为 12%,2017 年增加至 31%;相对而言,认为转出土地比较冒险和非常冒险的农户占比由 2015 年的 8% 下降至 2017 年的 6%,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增强,对转出土地的风险感知减弱。在风险感知的作用下,农户转入土地的意愿减弱,转出土地的意愿增强,农地流转难以实现快速发展。

农户对农地流转风险感知的变化可从三个方面寻找原因。首先,随着村集体、合作社、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等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加入,我国农地流转程序逐渐规范,土地流转期限延长,土地纠纷减少,不仅提高了流转土地的地权稳定性,也为转出户获得土地租金提供了保障,降低了农户转出土地时的风险感知。然而,第三方机构的参与也削弱了农户转入土地时的谈判地位^[26],增加了农户转入土地时的风险感知。其次,我国农地流转价格快速上涨,调研数据表明,2015 年样本中平均流转租金为 652.86 元/亩,2017 年上涨至 708.83 元/亩,上涨幅度约为 9%。Liu 等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发现,2009—2016 年土地租金由 227 元/亩增加至 791 元/亩,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19.5%,土地租金在农业生产总成本中占 38.1%^[27],加之广泛存在的预租制要求农户提前支付租金^[28],给转入户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增加了农户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最后,虽然我国农产品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其价格波动幅度不断增大^[29],成为影响农户经营性收入的首要风险^[30]。粮食生产是流转土地的最主要用途,2004—2014 年,我国粮食产量持续上涨,抵消了土地流转租金上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自 2014 年农业供给侧改革以来,粮食价格大幅下降,跌幅超过 30%^[31],对农户种粮收益造成了极大冲击。农产品价格波动增加了农户转入土地的收益风险,且流转合同的约束及机械设备的专用性增加了农户的违约成本^[32],导致农户在收益受损时不能及时退出农地流转市场,转入土地风险感知提高,转入土地的意愿降低。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和江苏 5 省 1 429 户农户面板数据就风险态度及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三点结论:第一,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生产中,更容易采用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农户往往更偏好风险,其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较高;对农业技术接受程度较低的农户不仅倾向于风险规避,土地资源的社会保障功能也较低,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较高。第二,农户风险规避态度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中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风险规避态度对转入决策、转入规模、未来转入意愿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分别为 5.8%、6.7%和 5.5%,对转出决策和转出地占比的中介效应与其影响方向相反。第三,农户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决策及流转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控制风险规避态度的影响后,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决策及规模的负向影响仍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当农户认为农地流转存在较高风险并超出承受能力时,流转土地的可能性及流转规模均较小,且未来两年内流转土地的意愿也较低。

综上所述,风险态度及风险感知对农民农地流转行为有重要影响,而土地租金的上涨及粮食价格的下降加剧了农户转入土地时的风险感知,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是近年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农户转出土地意愿有所增加,但农户转入土地意愿降低,我国农地流转难以跳出“内卷化”陷阱。为推动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损失厌恶是农户风险规避的重要原因,提高各类保险的覆盖面有助于降低农户损失,提高农户的风险偏好程度。建议提高各类保险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及赔偿力度,如各项农业保险及失业保险等。同时,建议设立农地流转保险,当流转一方违约时,设保机构对另一方进行相应的补偿,降低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不稳定因素。第二,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制定农地流转基准价格,形成以市场为指导的流转价格机制,同时注意防止流转价格过快上涨。第三,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对农产品价格进行有效调控,稳定农产品价格,保障农民收益。

参 考 文 献

[1] 马贤磊,沈怡,仇童伟,等.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40-47.

[2] 罗必良,李玉勤. 农业经营制度:制度底线、性质辨识与创新空间——基于“农村家庭经营制度研讨会”的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2014,35(1):8-18.

[3] 罗必良. 产权强度与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个引论[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6.

[4] FENG S. Land rental, off-farm 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farm households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J]. NJAS -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 2008, 55(4):363-378.

[5] BOGAERTS T, WILLAMSON I P, FENDEL E M. The role of l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accession of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J]. Land use policy, 2002, 19(1):29-46.

[6] 王亚辉,李秀彬,辛良杰,等. 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003—2013 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J]. 地理学报, 2018, 73(3):487-502.

[7] 孙小龙,郭沛. 风险规避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吉鲁陕湘 4 省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30(12):35-44.

[8] MOSCHINI G,HENNESSY D A. Chapter 2 Uncertainty,risk aversion,and risk managemen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ers[M]// MOSCHINI G,HENNESSY D A.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msterdam;Elsevier,2001:87-153.

[9] 仇焕广,栾昊,李瑾,等. 风险规避对农户化肥过量施用行为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2014(4):85-96.

[10] ULLAH R,SHIVAKOTI G P,ALI G. Factors effecting farmers’ risk attitude and risk perceptions;the case of Khyber Pakhtunkhwa,Pakist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2015(13):151-157.

[11] 刘莹,黄季焜. 农户多目标种植决策模型与目标权重的估计[J]. 经济研究,2010(1):148-157.

[12] PAUDEL K P,LOHR L,MARTIN N R. Effect of risk perspective on fertilizer choice by sharecroppers[J]. Agricultural systems,2000,66(2):115-128.

[13] 周波,张旭. 农业技术应用中种稻大户风险偏好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 1077 户农户调查[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6):584-594.

[14] LIU E M,HUANG J. Risk preferences and pesticide use by cotton farmers in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3(103):202-215.

[15] BRICK K,VISSER M. Risk preferences,technology adoption and insurance uptake;a framed experi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5(118):383-396.

[16] AIMIN H. Uncertainty,risk aversion and risk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e[J].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procedia,2010(1):152-156.

[17] 陈新建,韦圆圆. 风险感知、风险偏好与贫困农户风险管理策略[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1):74-85.

[18] ARBUCKLE J G,MORTON L W,HOBBS J. Farmer beliefs and concern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attitudes toward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evidence from Iowa[J]. Climatic change,2013,118(3-4):551-563.

[19] 穆瑞丽.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的风险分析与规避对策[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21(1):11-13.

[20] 陈振,郭杰,欧名豪.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徽省 526 份农户调研问卷的实证[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129-137.

[21] 杨卫忠. 风险感知、风险态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嘉兴市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2018,32(9):35-42.

[22] 李景刚,高艳梅,臧俊梅. 农户风险意识对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2014(11):21-30.

[23] MA X,HEERINK N,FENG S,et al. Farmland tenure in China:comparing legal,actual and perceived security[J]. Land use policy,2015(42):293-306.

[24] 江激宇,张士云,李博伟,等. 种粮大户经营风险感知机理与实证检验[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4):123-130.

[25]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2004,36(5):614-620.

[26] 王倩,任倩,余劭. 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农户议价能力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8(2):47-59.

[27] LIU Y,YAN B,WANG Y,et al. Will land transfer always increas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hina? ——A land cost perspective[J]. Land use policy,2019(82):414-421.

[28] 钟晓萍,王晓睿. 农村土地流转中预租制的流行及其影响研究[J]. 中国物价,2019(3):60-63.

[29] 张瑞雪. 我国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研究[J]. 价格月刊,2019(4):18-22.

[30] 徐欣,胡俞越,韩杨,等. 农户对市场风险与农产品期货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5 省(市)328 份农户问卷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10(7):47-55.

[31] 崔凯,苏梅.放心,中国的粮食可以养活中国人[N].科技日报,2018-02-23(1).

[32] 刘灵辉. 家庭农场退出诱发的利益冲突与化解策略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2019,33(1):49-55.

(责任编辑:毛成兴)